

蒙古文古籍采访述略

李金花

一、国家图书馆蒙古文古籍采访回顾

国家图书馆现藏有 890 号蒙古文古籍（不包括拓片和缩微胶卷），主要来源有四个，一是政府拨交；二是购买；三是捐赠；四是复制兄弟馆馆藏来补充本馆馆藏。

蒙古文古籍的入藏早在本馆建馆初期就开始了，当时殖边学校所赠四、五箱图书里就包括蒙古文图书，但真正登记入藏则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从蒙古文古籍登记簿来看，1963 年 12 月 10 日至 1976 年 9 月 16 日间登记入藏的文献有 484 号，其中有刻本、铅印本、晒印本、石印本、写本、油印本、照片、抄本、影印本、稿本、摄印本等。这部分书除了两部《蒙古源流》晒印本记载为原书故宫藏刻本、三部清刻本《上谕：军令条例》由装订室转来外，其他书的来源没有任何记载。这期间登记入藏文献应包括政府拨交部分。之后登记入藏了多种版本的书籍 383 件，其中复制品居多。然而，不少藏品有其来源说明，如《双钗记》购于私人，《四体合璧文鉴》、《四部医典》为购买；《大唐罗通扫北传》为捐赠。对来自兄弟图书馆藏品的复制品也作了相对清晰的记录。如《蒙古秘史》原件藏科学院图书馆，《汉蒙合璧字汇》原件藏北大图书馆，《喀尔喀赛音诺颜部兵丁名册》、《忠诚王官府记》原件藏北大东语系，《唐朝薛礼平定东辽记》、《鹦鹉的故事》、《善语宝藏》、《智慧钥匙》等原件藏民族宫图书馆，《蒙古源流》原件藏内大图书馆；《理藩院则例二种》、《蒙古民族风俗录》、《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系图表》等原件藏旅大市图书馆（今大连图书馆），《五世达赖喇嘛训言》、《内齐托音传》等原件藏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，《宗喀巴传》、《大元后裔蒙古各部归附大清记》、《水晶鉴》等原藏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，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原件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，《那卡朝纳训言及其他》、《隆佛寺与聚庆寺沿革》、《蒙古黄教史》原件藏内蒙古古籍办，《有关乌审旗多嘎伦运动之材料》、《杭锦旗新建妙德聚谷塔中藏籍及功德赞杜鹃妙音》原件藏内蒙古呼市图书馆（复制费 65 元）。部分藏品登录则只记转入、由装订室转来、由东编转入、由俄编转来、由中编转来、由线装转来等，无详细的转入年代。还有的文献只记录复制年或复制地。如复制于内蒙古、90 年复制于内蒙古、93 年复制于内蒙古等等。总的来讲，财产账簿的记录格式及记录项目不一致，而且不够完整、规范。

二、近几年蒙古文古籍采访

2005 年 3 月 30 日 我馆从民间征集 23 种 26 册（函），此外从北京嘉德拍卖会上买来的 1 种 1 册书。

民间征集者皆为清刻本，梵夹装，多数为佛经，如《菩提道次第初学入门》、《文殊师利教诫》、《道次第引导建立录》（藏蒙合璧）、《大解脱经》、《阎曼德迦五护守法》、《事师法五十颂》、《上师瑜伽》（梵藏蒙合璧）、《十六罗汉供养胜教元竭嘛呢经》、《道之三要启示心诀优婆提舍缘者津梁》（两部）、《法护赐阿底峡心剑轮》、《大菩提经》等。除外，有佛寺志《五台山志》，有文学作品清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刻印的蒙古族英雄史诗《格斯尔王传》（两部）、《青颈鸟传奇》，有藏蒙辞典《详解月光辞典》（藏蒙合璧）、《藏语新旧语词丁香宝帐》（藏蒙合璧），有蒙古语言文字学著作《蒙文启蒙诠释》、《阿礼嘎礼》。经拍卖会所得一件为道教文献《百种符咒》，民国时期写本，线装。

此次采访的蒙古文古籍中，《阿礼嘎礼》、《十六大罗汉供养胜教无竭嘛呢经》、《阎曼德迦五护守法》、《上师瑜伽》（梵藏蒙合璧）、《道次第引导建立录》、《百种符咒》等图书填补馆藏空缺。据《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》（简称“总目”），国内其他单位也极少收藏这些文献。下面就上述几种重要文献做一简单介绍：

1. 《阿礼嘎礼》，清刻本，共 8 叶，四周双栏，版框尺寸为 8.4×35.4 厘米，梵夹装，梵、藏、蒙三种文字合璧。阿礼嘎礼字是阿尤喜固什于 1587 年创制的蒙古文字，在原来蒙古文 30 个字母基础上增加约 10 个字母，用来翻译藏语和梵语词汇。清代蒙古文佛经中夹有大量阿礼嘎礼字，但纯以阿礼嘎礼字或者与其他文字合璧而成的文献十分罕见。国内，内蒙古大学图书馆、民族出版社资料室、富·布和先生等单位和个人均藏有阿礼嘎礼字文献，国家图书馆收藏仅此一件，具有很高的文字与文献价值。

2. 《上师瑜伽》，清北京刻本，共 16 叶，四周双栏，版框尺寸为 6.5×32 厘米，梵夹装。据“总目”，此经国内收藏有七种不同版本，有清代竹笔写本、民国时期毛笔写本，唯独此版本为清代北京刻本，同时又是梵藏蒙合璧本，国内另有内蒙古大学图书馆、民族出版社资料室藏此件。

3. 《百种符咒》，卷首题名为《jalgamjilan ularigulugsan arga bilig-un jagun darulga-yin kereglet-un bicig》，康德十一年（1944）毛笔写本，一册，尺寸为 25.8×24.8 厘米，线装。这是目前为止我馆收藏的唯一一种蒙古文道教文献的原件（原藏有《帝君觉世要语》的缩微胶卷），也是目前国内孤本。全书有以下四个内容：一，宅邸符咒；二，婚嫁符咒；三，墓葬符咒；四，全能符咒。人名、地名、物名等均为满文书写。全书文字之间有各种咒符插图。文末记录了抄写年代“康德十一年”。

4. 《详解月光辞典》，又称《浩月辉映词典》，共 139 叶，清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北京嵩祝寺刻本，四周双栏，版框尺寸 7.5×49.5 厘米，梵夹装。阿旺丹德（1759-1840）于 80 岁高龄时所著藏蒙大辞典。据跋文，本书针对初学儿童收录了通俗易懂的内容，增补《易学藏文》（清刻本，藏蒙合璧辞典），并参照清大库伦（今蒙古国乌兰巴托）版《藏蒙对照词汇》的基础上，收录了不少其他经书里出现的词。从“总目”看，此书另有几部同一版本。

5. 《藏语新旧语词丁香宝帐》，共 26 叶，清乾隆七年（1742）北京刻本，四周双栏，版框尺寸 7.4×48 厘米，梵夹装，藏蒙合璧。清释毕力贡达赖蒙译。本书以“什么是什么”的形式解释藏文所谓新旧词、词组间的区别。跋文提出辞典中的几种错误，如将部分汉字、蒙古语方言、道教词汇当作藏文旧词，将藏文错别字及敬语当作旧词等等。国内还有七家单位和个人收藏。

6. 《格斯尔王传》，共七卷，清康熙五十五年（1717）刻本，四周双栏，版框尺寸为 46.8×13.8 厘米，梵夹装，有夹板。这次买入两个复本，国家图书馆原藏有二部，其中 004 号藏品带有“图展”二字。据黄润华先生介绍，凡是带有此字样的均为好书，曾参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午门举办的图书展览会。《格斯尔王传》是蒙古民族著名史诗，与《蒙古秘史》、《江格尔》一同成为蒙古族古代文学三大高峰。其版本除了此北京版七卷本外，还有隆福寺格斯尔、十九卷咱雅格萨尔（1960 年出版于乌兰巴托）、二卷岭格萨尔、布里亚特版和卫拉特本。《格斯尔王传》先后被译成俄文、德文本，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。

7. 《青颈鸟传奇》，又名《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》。共 166 叶，清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刻本，四周双栏，版框尺寸为 8×45.3 厘米，梵夹装。我馆原有一部，封面标有“图展”二字，亦属“好书”。葛鲁派“洛桑登巴坚赞”为了歌颂观世音菩萨，于 1737 年写成一部史书，其中改编了一些佛教故事，这就是《青颈鸟传奇》。此书于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由藏文译成蒙文，译者为代固师·阿旺丹皮勒。据跋文，他 71 岁时将《青颈鸟传奇》译成蒙古文。《青颈鸟传奇》译成蒙古文后以刻本的形式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。此书还有毛笔抄本、布里亚特刻本、托忒蒙古文竹笔抄本。

8. 《蒙古文启蒙诠释》，清刻本，纸张尺寸为 11.7×41.5 厘米，四周双栏，版框尺寸为 8×31.8 厘米，17 叶，梵夹装，馆藏原有两部。乌珠穆沁（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）蒙古人莫洛木拉布金巴·丹金达格巴于 1723~1735 年间写成。《蒙古文启蒙诠释》是蒙古族现存语言文献中较早的一部文献，是一个以正字法为主的蒙古语早期语法著作。主要介绍 14 世纪初蒙古语言学家捌思吉斡节儿所著《蒙古文启蒙》的内容。《蒙古文

启蒙》已失传，其原貌赖《诠释》得以保存。《诠释》还涉及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一些史实。全书约 6000 字，由文字史、正字法、语言三个部分组成。讲述蒙古文形成发展史和字母系统、蒙古语格位系统的构成以及元音辅音的分类和组合、词类的区分、词缀法的运用、元音和谐等问题。此书还提出了“集字成词，集词成语，集语以表明意思”的语言原理。《蒙古文启蒙诠释》对研究蒙古族文字史、蒙古语正字法、蒙古语言具有原始材料价值。现存有刻本、石印本、铅印本。

可见，此次采访所得蒙古文古籍，文献及文字价值方面，均可弥补我们馆藏缺陷，相信为学术界提供新资料与信息。

三、蒙古文古籍采访设想

国家图书馆藏蒙古文古籍数量不多，其中有些是复制品，因此蒙古文古籍采访有待于加强。“总目”收录了多件个人收藏的古籍文献。蒙古人自古以来有着写经并传给子孙后代的传统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不少人不惜一切代价，把所藏古籍文献埋藏于地窖、山洞、墙根、老鼠洞等隐蔽处，从而部分宝贵文献得以留存。今天，不少蒙古村落仍然保留着家中供奉经书、邻里间传经抄书的习惯。据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叶尔达先生于 2004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几个县做的古籍文献情况调查报告来看，当地民众手中仍存有大量的托忒蒙古文文献、少量的近代蒙古文文献以及藏文文献。

叶尔达先生的调查只是以托忒蒙古文的文献为切入点，在很少一部分蒙古族当中做的调查。在中国，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、青海、甘肃、新疆、云南、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北京等省、市、自治区。近年来，随着文物市场的开放搞活，有不少人拿出其多年收藏的古籍出售给单位和个人。近年，国家对图书文化事业的关注日益增强，也投入大量资金来收购民间流传的古籍文献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，若有机会走访蒙古地区，积极开展采访工作，应能获得为数可观的珍品。

另外，从文献保存与保护的角度讲，民间收藏品没有合适的保存保护环境，加之收藏者也缺乏相应的知识，所以面临着消亡的危机。我们希望馆里在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加强蒙古文古籍的采访，一方面丰富我们的馆藏，与兄弟图书馆并肩前进，一方面拯救濒临消失的民族典籍，使其永存于人间，以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。